

戏谑背后的深刻

——《聊斋志异》中科举图景的还原与阐释

李力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蒲松龄一生赶考的经历,《聊斋志异》中大量的科举篇章,都为后世展开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科举生活图景。书中形形色色的鬼神、妖狐、女子和士子们通过日常的生活场景呈现出各自对于科举的喜怒哀乐,同时也极为巧妙地折射出了蒲松龄真实的科举心态和观念,其实远非通常所谓的那般绝对和简单。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大众舆论长期以来对于蒲松龄终身从事举业表现出的极大理解和宽容以及对范进中举评价的极为尖刻和不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在这种被夸大的“历史之同情”的语境支配和影响下,才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错觉”式的大众科举观念。我们需要真正抱着一种“不要批判,且去了解”的眼光去看待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

[关键词] 《聊斋志异》; 蒲松龄; 科举考试; 八股文

[中图分类号] G 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1)01-0076-08

公元846年,白居易仙逝,次年唐宣宗李忱写就《吊白居易》,其中“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1](P160)两句最能概括他一生的影响。公元1715年,另一位著名文学家悄然离世,但是在历经八百余年之后,这两句曾经帝王吟咏用来缅怀白氏的诗句,却仍然十分恰切地可以用来形容这位以极佳才情著就一部小说的翩翩君子——蒲松龄的一生行止,而这部小说就是被誉为“文言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志异》。这本书中浓的化不开的科第情结^[2](P225),形形色色的科举人物和五彩斑斓的科举众生相所共同描绘的科举图景,以及其生前和死后所获得的种种评价至今都使人唏嘘不已,怆然万分。

一、《聊斋志异》:

科以人重科益重,不以科传人更知

蒲松龄去世77年之后,晚清著名文学家龚自珍出生,他曾经以“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3](P72)来形容科举与士子之间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生于明末,长于清初且自幼文思敏捷的蒲松龄自然不会拒绝参加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虽然他早在十九岁第一次参加县府道的考试就连中第一,成为淄川县城年轻的秀才,但此后他却为争取成为一名举人奋斗了数十年,最后仍以失败告终。相反日后令他成为被文学史反复书写和记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却是那本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

而那略显单薄的秀才科名却恰恰使他有理由将前面的诗句改写为“科以人重科益重,不以科传人更知”。

后世眼中的蒲松龄大抵是一名文学家,但是,纵观蒲氏一生的行止,却不得不承认他最主要的身份还是要被还原为一名孜孜不倦从事举业,奔赴闹场达十次之多的秀才,而诸如馆师和幕僚都只不过是其应付生计和从事备考的过渡手段,抑或是为其从事文学创作提供素材的来源罢了。当周遭无数士子不断坚定并单纯践履“人以科传人可知”的经典信念之时,当友人一再告诫他要全部精力用于正途,“勿以闲思想,摧残天赋才”^[4](P150)时,他却在重复举业的同时,又在不自觉地默默实践着另一种迥然有异于此,堪称“不以科传人更知”的生存方式,这种特殊的体验和经历对于生活在“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5]的读书人来说实在是极具风险和莫测的,而他的这种行为也恰好从反面印证了科举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像堂吉诃德一般拿着长矛,勇敢地挑战那架普遍使用显赫的科名来衡量读书人基本价值的庞大风车,虽无法用成败论其结果,但使他留名青史的那根长矛却恰恰是那本被认为满纸鬼狐妖仙的《聊斋志异》。

鲁迅曾将《聊斋》推为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之最有名者,原因就在于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6](P147)虽然这种注重对人事进行

[收稿日期] 2010-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举学研究”(BA A 070046)

[作者简介] 李力(1982—),男,陕西西乡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教育史和科举考试研究

细腻的刻画和描摹的叙述方式在日后被纪昀讥为“《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作者之笔也。”^[7] (P353) (《姑妄听之(四)》)但自恃才高而又生性敏感的蒲松龄正是通过这种笔走飞天的想象来体现心志，渲染经历进而寄托感情。将《聊斋志异》称为“秀才的世界”并不为过，因为全书绝大多数篇章的主人公都是千篇一律的诸生，尽管最终能称之为“考试英雄”^[8] (PP. 3-7)的寥寥无几。“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察。”^[9] (郑振铎序)如果以书中的故事内容和主题能够明确地反映出作者对于科举方方面面的态度和认识为标准的话，以二十四卷抄本的《聊斋志异》为例，全书至少有60篇可以明确视为蒲氏科举态度的代言之作，这些篇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大多数是作者通过完整和详细的故事情节，细腻的人物语言和行为刻画来明确表现其对于科举的态度；另一小部分则内容简略，作者仅在其寥寥数笔中不经意地提及有关科举的细枝末节，不过其科举态度需要细细琢磨才能品出个中味道，就是在这些嬉笑怒骂和戏谑讽刺的文字背后，书中的科举图景已然得以浮现。

二、科举图景：

淋漓尽致众生相，归根到底念科举

《聊斋志异》的科举图景中，上至仙人，下至鬼狐，不分男女，无一不与科举发生若即若离的关系，蒲松龄就在它们背后恣意自如地抒发着自己关于科举的丰富情感，在角色变化和词语闪烁之间，重温着自己屡试不第的哀痛，享受着一举高中的狂欢。

(一) 鬼神亦能通时文：“人情鬼蜮，所在皆然”

书中所有涉及科举最多的内容莫过于时文，而且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没有阴阳的畛域之分，鬼妖狐大都精于此道，用蒲松龄自己的话来说真所谓“人情鬼蜮，所在皆然”^[10] (P279) (《念秧》)，大有“如果不是谈鬼，恐怕就没有法子谈得那么痛快”^[11] (P6)之感。当朱尔旦问陆判“知制艺否”时，陆判坦言对于时文“妍媸亦颇辨之，阴司诵读，与阳世略同。”^[10] (P76) (《陆判》)一位名叫侯静山的猴仙“与人谈诗文，决休咎，娓娓不倦”，甚至能够对刚考过的闹场试卷点评得头头是道：“公闹卷亦佳；但经不熟，再须勤勉，云路亦不远矣。”^[10] (P96) (《侯静山》)有的甚至亲自替主子批点课艺，热衷于助人题名金榜。家中屡被狐仙所扰的郭生无意中发现被狐仙涂污过的窗课，“其所涂留，似有春秋；又复视泐卷，类冗杂可删。”经过试验，“郭以是德狐，恒置鸡黍，备狐啖饮。每市房书名稿，不自选择，但决于狐。由是两试俱列前名，入闹中副车。”^[10] (P341) (《郭生》)有的在面对侃侃而谈，实则狗屁不通的酸腐士子时也忍不住恃才嘲弄和挖苦一番。“累冠文场，心气颇高”的王勉偶然来到了仙人岛，当在宴席间被要求展示其制艺，“王诵至佳处，兼述文宗评语，有云：‘字字痛切’。……王诵毕，又述总评，有云：‘羯鼓一挝，则万花齐落。’”而在一旁听的仙人绿云和芳云则“每数句，

姊妹必相耳语，似是月旦之词。”最后评价王勉之作为“去‘切’字，言‘痛’则‘不通’，鼓四挝，其声云‘不通又不通也。’”^[10] (P464) (《仙人岛》)有的仙人甚至还可以预测到即将举行的闹场试题。士人某在前往金陵赴试的途中，结识了三个秀才，推杯换盏之余，三秀才以预测考场题目为戏，并各自交换题目行文，某暗自将他们所作之文牢记，最终“以是擢解。”^[10] (P744) (《三仙》)

(二) 妖鬼入闹战科考：“三场毕，此愿了矣”

《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妖仙们也不仅仅是只会口谈子曰诗云，扶乩占卜，与人决场屋内的休咎，相当一部分甚至亲力亲为，一定要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闹场中去搏杀一回方肯罢休，对它们而言，真可谓是“三场毕，此愿了矣”。周克昌是淮上贡生周天仪晚年所得之子，但“性不喜读，辄逃塾从群儿戏，恒终日不返。”一次外出游玩过了年余才回家，没想到“逾年，文思大进，既入郡庠试，遂知名。”再过一年，“秋战而捷”，但是由于他行为怪异，在家人的反复逼问和督责之下，“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蛻。”第二天真的周克昌才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依然如以前一样冥顽不灵。^[10] (P510) (《周克昌》)褚生是同顺天陈孝廉一起下帷攻苦的同伴，“未几陈入邑庠，即以遗才应试。”褚生主动要求代陈入场考试，考完后才以实情相告，他实为鬼，“三场毕，此愿了矣”^[10] (P520)，方去投生。(《褚生》)即使在阴间科举也被认为是选才的最佳方式，在那里也要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而且考题都与阳世一样。北平陶圣俞在赴乡试的途中结识了一名准备前往冥间参加科考叫于去恶的鬼，经过一番鏖战他最终被录取为交南巡海使。^[10] (P559) (《于去恶》)顺天俞慎在赴试途中认识了俞恂九和俞素秋兄妹，本无意科举的俞恂九看见俞慎屡试不第，大为扼腕，“奋然曰：‘榜上有名，何遽艰难若此！’”遂奋然入闹，在获得了秀才之后也同样止步于乡试，黯然殒命之后，心有疑惑的俞慎打开棺材才发现馆内“有蠹鱼径尺，僵卧其中。”连蒲松龄也慨然评论道：“蠹鱼之痴，一何可伶！”^[10] (P639) (《素秋》)

(三) 女子：“雄飞不如雌伏”

女子本于科举无缘，但是在《聊斋志异》中不乏在科场内外巾帼不让须眉的场景，以至于蒲松龄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承认“雄飞不如雌伏”。^[10] (P644)有时女子的见识竟高于男子，凤仙就劝丈夫刘赤水：“君一大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黄金屋自在书中，愿好为之。”并拿出一面镜子给他道：“欲见妾，当于书卷中觅之。不然，相见无期矣。”从此发奋的刘赤水“如此二年，一举而捷。”^[10] (P565) (《凤仙》)而当自己的丈夫不学无术，洋相百出时，她也会毅然离他而去。嘉平某公子不学无术，在给仆人所写的谕帖中极多舛误，尤其是将“椒讹菽，姜讹江，可恨讹可浪。”他的鬼妻见其书后慨然写下“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后“言已而没。”^[10] (P760) (《嘉平公子》)如果夫君一再下第，妻子也会忍不住披挂上阵，俯拾青紫而后快。顺天某生娶颜氏为妻，颜氏“朝夕

劝生研读，严如师友。”但某生却“再试再黜，身名蹇落，囊粮不给，抚情寂寞，嗷嗷悲泣。”颜氏遂女扮男装，易容为某生之弟，与他一起挑灯攻苦，最后颜氏接连考取举人和进士，最终“富埒王侯。”书写至此的蒲松龄也不禁直言“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10]（P368）（《颜氏》）

（四）士子：“秀才的世界”

鬼尚如此，人何以堪！蒲松龄在书中安排好鬼神的预测和襄助魔力，女子的相夫陪考乃至替夫代考之后，真实生活中真正应该搏杀和角逐于场屋内的主人公——士子们纷纷登台亮相，于是一个围绕着秀才世界的别样图景就在秀才班头^[12]（P126）的笔下徐徐展开。“《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的篇章不少，其中描写得最多的是名士的怀才不遇。”^[13]（P272）他为了安排这些名士奔赴考场颇是煞费苦心，从备考，入考乃至是否得中都考虑得十分周到，而他也将自己幻化为书中的主人公尽情地分享着红袖添香之乐，回味着落第失落之苦。

1. “词赋文章，华国之具也”

文章，尤其是时文是书中谈及科举时牵扯最多的一类事物，蒲松龄对其的真实观念其实就一句话：“词赋文章，华国之具也”。蒲松龄共在两篇文章中明确将此语用来形容其对于文章尤其是时文的态度。进士出身的周亮工在青州为官时，根据题在扇子上的一首诗为线索，从而判决了费解的杀人谜案。蒲松龄对其颇为赞赏，甚至将其比着著名的伯乐，“天下事，入之深者，当其无有，有之用。词赋文章，华国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称孙阳焉。岂非入其中深乎？”^[14]（PP. 304-305）（《诗谏》）如果仅仅将其视为性情中人的蒲松龄一时激慨之说的话，那么当他对另外一个事例需要做出评价时，不仅重复上述语言，而且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就不得不考虑其屡作如是语的背景和心态了。进士出身的新郑宰石宗玉判决了一宗离奇的抢劫案，蒲氏在认为“石公此类甚多，亦见其实心为政也”之后，进一步加以评论：“石公为诸生时，每一艺出，得者秘以为宝，观其人，恂恂雅饬，翰苑则优，似非簿书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噪于河朔。谁谓文章仅华国之具哉！”^[10]（P806）（《新郑讼》）估计他就只差在后面接着说此真乃衡士之巨器矣这句话了！细细考察这两则故事的背景，都是以为官断案为主题，均是蒲氏在对实际生活做出了解之后所得的结论。在《诗谏》中他指出正是因为周亮工深谙词赋文章之道，所以能够举重若轻地在为文和为官之间轻巧挪移，而在《新郑讼》中当石宗玉善于决狱时，蒲松龄不禁将这追溯到了他的诸生时代，并直言其在那时就以艺惊人，如果进一步将这艺理解为制艺应该不为过，因为两人的身份都是经过科举出身的进士，而身为进士又不精于此道应该就不会有后来的官可作，狱可决了，蒲松龄就是这样在评价上述事例的同时淡然自若地表明了自己对于时文的真实观念。

在奠定了这样的基调之后，书中屡屡出现人神和男女

之间畅谈时文的场景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类似陆判主动为朱尔旦换心更可推其为鬼神界对时文态度的代言人。佛经在《聊斋志异》中的作用不可谓不大，经常被蒲氏安排用来救人于水深火热和黑暗深渊之中。汤聘在弥留之际，魂魄出窍为一巨人纳入其衣袖之中，“公顿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号。才三四声，飘坠袖外。巨人复纳之。三纳三坠，巨人乃去之。”最终也是在菩萨的帮助下，气绝数日的他才得以复生。^[10]（P162）（《汤公》）但是在某些篇章中，时文竟也达到了如佛经般的地位和作用。蒲家庄的煤井突遭水淹，十多人沉溺水中，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排水之后，他们竟然安然无恙。蒲松龄根据这一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创作了《龙飞相公》一文。戴生“少薄行，无检幅。”偶遇已故的表兄季生，告诉他死后会入黑暗狱，只有开始多做善事才能避免，但是又担忧其“穷秀才有何大力？”一日，戴生因被邻人怨恨而推入枯井之中，并将井口填满已绝其后路。戴生见周围一团漆黑，无奈之下“因思重泉下无善可行，惟长宣佛号而已。”没想到竟由此结识了其已故去，长埋于此的叔伯龙飞相公，当听说自己在阳间的子嗣毫无作为之时，相公大怒“此等不肖，其后乌得昌！汝既来此，当毋废读！”而所读的竟“皆成、弘制艺”，“惟制艺百首，首四千余遍矣。”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三四年之后，当相公认为其“孽报已满，合还人世”时，戴生居然安然还世，而且“是科以优等入闱，遂捷于乡。”^[10]（P668）当读者正在为书中的场景苦苦思索而百思不得其解时，蒲氏却在离奇情节的遮盖之下悄然将前后文的“大善”概念进行了偷换，将前文为表兄季生所担忧的无法行善，由刚落入枯井时的佛默默地转换为了后来的成弘制艺，于是佛经在此时就与风马牛不相及的时文不知不觉地画上了等号。

当然，蒲松龄对于时文不会无原则地接纳和吹捧，一旦出现酸腐难耐的低劣时文时，他也会用那支生花妙笔着实来调谑，惩罚甚至棒杀那些对此仍孤芳自赏的歪科甲们。

山西平阳府的王平子在前往顺天府参加乡试的途中，结识了余杭生和宋生，试毕，三人同游兰若之时，偶遇一个能以鼻子闻出文章高下的警僧。当他嗅到余杭生之文时，“咳逆数声，曰：‘勿自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高；再焚，则作恶矣。’”而第二次再闻余杭生的老师，也就是考官之文时，“僧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蒲氏的情节设计和描写可谓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蒲氏借警僧之口表达的仅仅是对劣质时文的厌弃，而并非针对时文本身。但是对于高质量的时文，蒲氏非但不嘲弄，反而还要借助警僧之口加以赞叹，表示欣赏。余杭生为了试探警僧是否真正能够感知文章的优劣高下，故意焚烧了以前有名的时文大家的作品以探虚实，“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此处的归和胡分

别指的是归有光和胡有信，他们都是明代著名的八股大家，当警僧闻到的是以清真雅正而著称的八股大家的文章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我心受之”的欣赏和愉悦，丝毫没有半点的厌恶之情。

岷州龚生在前往西安赴试的途中结识了慷慨豪爽的苗生，试毕，龚生与好友三四人前往华山游玩，途中苗生也参与进来。当有人提议大家作联句之戏时，苗生声明“不佳者，当以军法从事！”后来有人“以次属句，渐涉鄙俚。”苗生在一忍再忍之后，“遽效作龙吟，山谷响应；又起俯仰作狮子舞。”稍后当又有人把自己在闹场中所作诗句吟咏把玩并相互吹捧时，苗生先是“不欲听”，既而，“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哮而去。”痛快的杀伐之后，蒲氏意犹未尽地大发评论：“得意津津者，捉衿袖，强人听闻；闻者欠伸屡作，欲睡欲遁，而诵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觉。”蒲松龄对此也是态度明朗，“故厌怒者苗也——非苗也”。^[10] (P762) (《苗生》)可见他对于此种现象十分厌恶，这种现象最终被其在其他篇章中定型为一种近乎调侃式的称谓：歪科甲谈时文。夜里，课业山中的沂水秀才某的房中突然来了两个美人，一美人掏出一张写有字迹的白绢，一美人则掏出三四两金子，当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金子之后，美人收回白绢，留下一句“俗不可耐”之后就消失了，当然金子也随之不见。蒲氏在痛骂秀才“是乞儿相”之后，又即兴总结了他认为最俗不可耐的十七件事，其中“对酸俗客。秀才装名士。歪诗文强人观听。歪科甲谈时文”这些与文人墨客不无相关的事件都赫然在列。^[10] (P440) (《沂水秀才》)

2. “古来才命两相妨”^[15] (P16)

在所有能够决定科举中第与否的因素中，道德和命数是蒲松龄唯一不曾抱怨的。大概在他看来，道德与文章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德行作为修身程度的体现和反映与文章的高下本就是相辅相成的，而命数则更是绝非个人所能掌控和干预的客观因素。因此，书中由这两方面影响所导致的科考结果，蒲氏大致是没有异议和太大不满的。

孙子楚被世人嘲笑为孙痴，为了追求美丽的富家女阿宝真是痴到了极点，其魂魄竟然离开了躯体而伴随阿宝左右，后又附体阿宝所养的鹦鹉，最终两人共结连理。就是这样一个看来极痴之人，在参加乡试之前，将几个恶少欺骗他是关节试题的七道试题作得烂熟，没想到最后竟然全部被猜中，高中头魁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又中进士，授翰林。蒲松龄认为正是由于“性痴则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10] (P120)，才导致孙子楚有此回报，所谓的孙痴俨然成了大智若愚式的人物，所以即使是侥幸得中，在蒲氏看来也是自己注重修身的自然结果。(《阿宝》)景生为了赢取新欢阿霞，不惜狠心休掉结发妻子，岂料被“冥中削禄秩”^[10] (P214)，阿霞不仅因此离他适配他人，而本属于其囊中之物的乡试亚魁自然也如花落流水般逝去，真可谓美人因积德而来，科名因败德而去(《阿霞》)。《姊妹易嫁》中的毛公也因为乡试前夕，因“以阴欲易妻故，

被冥司黜落。”而在三年后再次赴试时被告诫“秀才宜自爱，终当作解首。”^[10] (P258)后连中解元和进士，最终官至相国。

“君疲马牛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悞”。^[16] (P484)在致好友孙树百的信中，蒲松龄不无感慨，他笔下的士子也似乎生来就注定成为“窗下莫言命，场中莫论文”这句科场名谚的注脚。叶生“魂从知己，竟忘死耶”达三年之久，原因就在于“所遇不偶”“是殆有命”；康熙十二年(1673年)状元韩爌在当年未发迹仍为诸生之时，曾被阎罗请去坐馆，因而被告知：“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壤未尽耳。”最终“坎坷数年，作会、状，其言甚验。”^[10] (P771) (《元少先生》)。《司文郎》中警僧那句“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可以说道出了命数之于科场的关键和在蒲松龄心目中的位置，以至于蒲氏在其《挽选扬道》中也忍不住疾呼“善人偶出天已妒，天下滔滔宁非数！”^[16] (P466)而宋生劝慰王平子的一席话则可视为他对于道德和命数二者完整的态度：“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

3. 一堂礼乐鬼门生，不能因君换肺肠

如果说蒲松龄对于道德和命数尚无怨言的话，那么他对于考官颟顸昏庸和贪腐无能的揭露和刻画则可称为最是极尽能事和不遗余力，而这“一堂礼乐鬼门生”^[10] (P398)们也着实让他花费了不少的心思来设计和想象。

作为考稽纠察科举考试弊端的考弊司本应庄严肃穆，但在他眼中却是一个鬼魅猖獗横行之地，它的长官叫虚肚鬼王，“卷发鲇背，若数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倾，不承其齿。”其余的随从大都“半狞恶若山精。”更让士子们胆寒的是，“初见之，例应割髀肉。”(《考弊司》)而具体主持考试的官员更是出人意料。负责阴司判卷的考官却是来自上古的盲乐官师旷(《于去恶》)；代替文宗阅卷的幕客则更是“前世全无根气，大半饿鬼道中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损其目之精气；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则天地异色，无正明也。”^[10] (P620) (《何仙》)更有甚者，有时“帘中人不仅目盲，而且鼻亦盲。”面对这样的考官要想脱颖而出，其实亦非难事。贾奉雉“才命冠一时，而试则不售。”经过郎秀才的点拨之后，刻苦攻读他所推荐的“一二人，一二篇，以为标准，大率贾所鄙弃而不屑通者。”他一再告诉贾，“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贾按照此法备考，竟然高中乡试榜首。当他回头再读自己的试卷时，“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在长叹“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之后遂隐遁山林。^[10] (P645) (《贾奉雉》)在这种背景下所录取的结果自然就是妍媸不辨，美丑不分。大罗刹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所重者“不在文章，而在形貌”。但在它的眼中，一般认为长得美的被视为丑陋，而越丑的人反而容易荣登高位^[10] (P228) (《罗刹海市》)。而寒窗苦读数载的士子们自然做鬼也不会放过这些害的他们黜落的考官，在《三生》一文中，冥司中无数的

士子冤魂强烈要求阎罗将两个考官剖心以示公正，最终当“以白刃彘胸，两人沥血鸣嘶”时，“众始大快。”真可谓“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10]（P631）

4. “世间岂谓无英雄”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17]（P32）在通过鬼狐神妖和凡夫俗子点缀《聊斋》中的科举图景的同时，蒲松龄也时时按捺不住思如泉涌的才情，适时地利用书中的场景留下自己的模拟考试文字，有的竟然成为名作被广为流传。“清代规定，乡试、会试第二场试诏、诰、表各一道，表用于臣民对皇帝的奏议或陈述，判属于判断刑狱案件的评语。”^[18]（P20-24）作为科举考试文体中的两类，它们都属于应用文写作，显然对其钟爱有加的蒲氏，经常在故事情节的推波助澜下，不时对主人公判决一二。席方平历经艰险代父喊冤，足迹踏遍阴阳，最终由二郎神宣读由蒲松龄代写的判词^[10]（P635）（《席方平》）；他又借吴公之口对胭脂一案进行了洋洋洒洒的宣判，判词篇幅之长，内容之逼真，以至于在光绪年间，江苏和福建的两位地方官竟模仿其中的判词写成骈体文判词，据说也“家弦户诵，传播一时”。^[19]（P6）另外，在《蒲松龄年谱》^①里也留有其大量的应对考试之作。^[20]

三、结语：“不要批判，且去了解”

历来对于《聊斋志异》看法各异，有人认为“姑妄言之故听之”即可，有人却不仅认为其等同“诺皋、夷坚，亦可与六经同功，……而况勃萃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10]（高珩序言）有人觉得“希望在这些鬼故事中发掘出所谓社会意义，如揭露、影射、批判等，这是非常煞风景的事”^[21]（P392），有人却坚信其“非为谈狐论鬼，实为假鬼狐而道尽人间不平耳”^[22]（P8）。总之，人们见仁见智，总是抱着不同的心态和持有不同的体验来看待和欣赏它。但是，对于真实的蒲松龄我们是否有客观的了解呢？毕竟如果“未必能予以同情之理解，似乎也未必真有批评之资格。”^[23]（P70）

（一）科举，有多少恶评假汝之名以行

首先来观察和对比一个普通而有趣的现象：蒲松龄一生十次参加乡试^[24]（P108），结果都铩羽而归，直到七十一岁才当上了岁贡生，其科考经历不可谓不艰辛。《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在五十四岁时仍是童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25]（P36）紧接着中了举人，于是就有了现在无人不知的“范进中举”。如果仅从与科举考试发生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过一个是童生试屡屡不中，一个是乡试屡败屡战罢了。但是历来对于二者的评价却是天壤之别，范进的疯癫痴呆已经成为大众所广为熟知的经典形象。相比之下，对于蒲松龄的评价却显得极富“同情”和“理解”，认为他不仅没有过分沉迷于腐朽科举而不能自拔的酸腐和迂执，而且还被誉为勇于批判和揭露不合理和黑暗的科举制度，俨然以反科举斗士的面目示人。而在解释蒲松龄为

什么始终不能中第的原因时，民间也更乐意制造美丽有趣的传说故事来为其点缀，“山左蒲留仙，好奇成癖，撰《聊斋志异》，后入棘闱，狐鬼群集，挥之不去，竟莫能得一第。”^[19]（P3）或者故意为蒲氏的落第安排一些被人们主观心理情愿接受的因素来予以说明^②。可以说，与强加于范进的那些恶评相比，我们对于蒲松龄真的是极富人情和宽容。

范进在《儒林外史》中算是很早就出场亮相的人物，而且一出场就不同凡响，可谓一疯名天下，但是他在书中正面出现的机会并不多，首次是在第三回，在周进的提携下，考了二十余次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进了县学，又于是年中了举人；紧接着在第四回，讲述他的老母去世以及他和张静斋去拜访汤知县的过程，除此之外并无过多的笔墨和篇章来正面涉及他。认真检索语及范进之处，使其受尽后世抨击和嘲弄的无外乎那著名的中举之疯，无论他的这种表现是否由科举压迫所造成，仅需稍举些许史实就可以看出范进真的并无可笑之处^[26]（PP.40-42）。

作为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竞争激烈的选拔考试，其带给应试者生理和心理上一定的压力实属正常，科举考试亦是如此，无论是才疏学浅的范进，抑或是自恃才高的蒲松龄都不能例外。当我们嘲笑范进疯癫不止，窘相毕现的同时，如果设身处地的设想一位年逾五旬却仍要来回奔波于考场，同时又面临着家中无米下锅的凄凉的老者，其在意结果而且表现出并非极端可怖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言其并非极端，在于在现实的科场内就不乏因心理问题而自残或自杀的情况，据钟毓龙回忆，“壬寅科二场，闻场中考生死者三人。一死于蛇，一以烛签自刺，一自碎其拳丸。”^[27]（P73）相比之下，痰火攻心癫狂了一会就清醒的范进如果听说此事，定会为自己仅仅挨了那一巴掌而庆幸不已，更何况这种因考试结果而情绪波动导致行为失常的情况在蒲松龄身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书中的一些主人公就被鬼狐抓住了这种心理着实被戏弄了一番。考完乡试的王子安在等待放榜的前夕醉卧家中，接连被报中举人、进士和点为翰林，“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的他在连呼那报喜之人却没有回应时，只听得一句“措大无赖，向与尔戏耳，而真骂耶？”之后，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狐仙所开的玩笑而已。想必对于入闱和等待放榜有很深体会的蒲松龄正是基于这种感觉，才写出了那篇极为传神的秀才七似之文吧！^[10]（P588）将这种反应的出现单纯归结为科举考试对于人的戕害和压迫所致不过是皮相之谈，即使没有科举，换成任何一种性质如此的活动一样都会如此，诸如赌徒和彩民因赌资和头彩猝死，毕竟这些都是在激烈的竞争和压力之下会表现出来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罗兰夫人曾在临刑前遗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28]（P479）。科举又何尝不是如此，范蒲二人类似的经历和不同的评价就是显例，相同的科举人物却以因人而异的评价标准来加以评判，而所依据的标准居然又是先入为主的认为科举罪大恶极的观念，大有使人生出“科举，多少恶评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叹！

(二) 被夸大的“历史之同情”

长期以来作为小丑式样板的范进，其被阅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就在于凭借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印象，假科举之名对其而行的不公评价，而关于蒲松龄貌似公允的评价大体也与此相去无几。需要说明的是，将范蒲二者进行比较，并非单纯要为范进翻案，也不是要刻意去贬低蒲松龄在大众心目中已有的形象，原因就在于当蒲松龄一生赶考而郁郁不得志时，与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的却是由《聊斋志异》一书所带来的文名日盛的事实，这使得在对其进行解读时不自觉地产生了所谓被夸大的“历史的同情”。而导致这种貌似合理，实则不公的同情感的主要因素就在于《聊斋》一书，正是它使得范蒲二者参与科举的行为本无本质区别，但却又形成了历来对他们截然相反和极端的评价，也形成了大众具有选择和宽容性，对人而非对事的科举评价观念。^[29] (PP. 5-13)

陈寅恪曾在《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提出了“历史的同情”这一观点。“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30] (PP. 9-11) 而所谓的“历史的同情”，“其大义有二：于古人所处之环境理解古人，而不是用今人的观点批评古人；于历史史实中求结论，而不是将历史史实填入构建的逻辑系统中。”^[31] (P9) 我们在阅读历史文本和理解作者观点的时候，往往存在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情况，即易于在已有历史观念制约和指导的影响下，过分地同情作者的倾向，表现为读者善于主动替作者去阐发和解释他的观点和态度，进而擅自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而单独解说文本的局面，姑且可以将其称之为被夸大的历史的同情。

但是当翻阅有的《聊斋志异》版本的前言时就会发现，每当在论及书中的关于科举之处时，大都为“反映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而当评价蒲氏所谓的消极思想时，却又无一例外的认为是“时代与阶级给作者造成的局限。”^[14] (前言) 可是翻尽《聊斋》一书，蒲氏所愤慨和抨击的所谓黑暗和不合理只是局限在考官颞顽、关节通行、贿赂成风和低劣时文及其作者等方面，并没有对其他任何方面有所不满，而这些又只是科举制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人为问题，并不等同于科举制度本身。相反，蒲氏对优秀时文的推崇，对歪科甲的鄙视也清楚明白地展示了其态度，既是如此，所谓毒害一说又从何而来呢？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科举制创立以来，即使到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也已经悠悠千载过矣，“物盈则亏，法久终弊”，长时间的制度运行出现弊端和问题本是极为正常，只能说那些唯独希望一种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犯不得半点差错观念本身就极为荒谬不堪，而出现诸如“抨击科举弊病，却又称道或憧憬功名利禄”这样企图借助批判这

些弊端来否定科举制存在的合理性更属因噎废食之举，功名利禄本来无可厚非，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它与批判科举弊端并非对等关系，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当然也更不是什么是是否能够免俗的问题^③。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会全是淡泊名利，隐遁山林，满街满眼望去都是圣人式的人物，那么这个社会的可怖与静寂是不难想象的。按照人之常情，对于一个几乎将一生精力倾注于科举，以至年老体衰而不停的老人来说，他有十二分的理由利用自己手中的如椽大笔好好地来诅咒这个令自己一生淹蹇的制度，但是遍览《聊斋》一书，他所关注的的确只有那些在某些人眼中被认为是还不足以使科举制毙命的弊端。而且他的这种态度也绝非能由所谓的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一言以蔽之，只要发现直到今天还有人不能理性地去分析和总结科举制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还有人不能认识到“高考并非万恶之源”^[32] (PP. 125-127)，仍然一味地鼓吹废除统一高考，就知道所谓的局限性不过是皮相之说，不足为据。难道真的非要一个古人大声疾呼和义正辞严地表述令今人满意的话语才能说明其先进吗？非也！我们需要的绝非是按照主观去构建和想象过去，而是真正的去同情和理解过去，而客观地将作者“我心写我口”的原始感情完整地予以展现，逐渐建立今人对于古人充分而恰当的合理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历史的同情”之真义，也是真正理性认识科举人物的必由之路。

(三) “可怕的错觉”

曾有人说“后世看前代的遗产，有一种特殊的心理，就是多看其好，而忽略其坏。”^[33] (P135) 此语大不尽然，起码现今大多数人对于科举的理解就非如此，更勿论对于曾充盈科举时代的无数士子们。正如“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废科举”^[34] (PP. 60-72) 一样，我们一方面需要将《聊斋》中蕴含的蒲松龄关于科举的真实态度客观还原和理性廓清，同时，这又并不意味着对于其所言之有关科举的一切拥护称赞，认为都是正确合理一样，“因为两者的层次不同，前者是历史的层次，后者是思想的层次。”^[35] (《自序》P4) ^④正如曾为韩愈和蒲松龄撰写传记的已故日本学者前野直彬就坦言，自己写作“最初的动机并不在于想发扬他们的遗德，也不是想把他们塑造成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主要的目的还是想描写出一个终生不遇的文人的典型形象。”^[36] (原序)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最迫切的是纠正一种态度，再彰显一种态度，即“我们顶喜欢用主观的好恶，去下客观的判断；很少的人能用客观的了解去确定主观的判断。”^[37] (P2) 这种态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对于当今大众科举观念的影响至深至远。蒲松龄逝世126年以后，英国学者查尔斯·麦基于1841年出版了极具影响的《可怕的错觉》一书，他对于发生在人类历史上诸如全民投机炒股、炼金术、圣物崇拜、占卜和预言术等12个集体性的大众癫狂事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称其为人人都会的致命错误^[38]。如果他生活在中国的话，必定会将从

古至今一直弥漫于大众头脑中的科举观念也列于书中，因为科举在古今中国，上至贵胄，下至引车卖浆者都可谓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堪称国民性的观念，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它同时又是极其陌生和寂寞的。仅以八股文为例，已故的启功先生不就有直言，“‘八股’二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陈词滥调’或说‘死套子’、‘滥调子’的代称，使人厌弃，遭人反对的一切坏事物的‘谗谏’、‘恶谏’。我曾遇到过用这二字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用说八股为什

么么坏的理由了。”^[39] (PP. 41- 63) 对待只是作为明清科举制度之一部分的八股尚且如此，又更何言能够历史地合理地看待整个的科举制度了。如果现在仍然有人要将理性、深入、全面和客观地研究科举制度理解为替科举制招魂的话，笔者倒真心希望能够成为替科举“招魂”队伍中的一员，毕竟总要先把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长达1300年之久的古制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清楚，然后才能开始进行所谓的招魂吧！

[注 释]

- ① 通过整理《蒲松龄年谱》可以发现，在康熙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一年和四十四年共12个年份里分别留有蒲松龄为应对考试所作的数量不一的拟表。
- ② 通常的说法是蒲松龄本已被主司确定要录取，但是在二场因故而被黜落，而且对本次乡试的详细情节都有详细记载。康熙二十九年，“是年秋，赴济南应乡试，第一场试题：子曰日譬之宫墙，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一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时主司已拟元，二场因故被黜，主司惜之。”（路大荒著，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1页）但是，这个说法后经考证已被推翻，因为“康熙二十九年山东乡试并没有这个题目”。可参见韩田鹿：《漫说聊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 ③ 曾有论者将科举与中第美其名曰不能免俗：“与江淹梦

笔的原始形态的故事相比，以金榜题名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不再含含糊糊地向往文才、文采了，他们希望通过换心而达到的目标是明确得很，那就是中举及第。在这点上，连蒲松龄也未能免俗，这大概就是所谓‘时代烙印’吧。”可参见何天杰：《聊斋的奇幻真真》，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48页。

- ④ 林毓生曾在评价五四人物时提出：“了解了客观的因素可使我们对五四人物不必深责。不过，我们站在关怀未来思想与文化发展的立场，却需对五四思想中某些至今仍占势力的部分加以严格的批评，以免重复其错误，以便使它们不再在中国发生恶劣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并分别将其定位为历史和思想的层次。这种思想方法同样可以用来评价和分析各种历史人物。

[参考文献]

- [1] (五代) 王定保. 唐摭言·卷十五杂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2] 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3] 刘逸生注.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4] (金) 董解元. 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卷第五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5] (清) 何刚德. 客座偶谈·卷二 [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 [6]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7] (清)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8] [美] 孙开键, 李红利. 才子救佳人: 中国的考试英雄 [J]. 教育与考试, 2007, (6).
- [9] 孔另境编辑. 中国小说史料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10] (清) 蒲松龄. 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 [11] 双翼. 聊斋志异今谈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
- [12] 袁世硕, 徐仲伟. 蒲松龄评传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3] 田建荣. 中国考试思想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4] 张学忠. 聊斋志异选译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 [15] (唐) 李商隐. 李商隐全集·有感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6] (清) 蒲松龄著, 路大荒整理. 蒲松龄集: 上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7] (明) 吴承恩著, 刘翥业辑校, 刘怀玉笺校.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二郎搜山图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18] 张亚群. 漫议科举考试文体 [J]. 中国考试, 2007, (3).
- [19] 何天杰. 聊斋的奇幻真真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 出版社,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2.
- [20] 路大荒. 蒲松龄年谱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 [21] 谢谦编著. 国学词典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2] 孙光浩. 聊斋志异是与非 [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8.
- [23] 钱文忠. 神州袖手人甲子祭 [J]. 读书, 1998, (5).
- [24] 韩田鹿. 漫说聊斋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5] (清) 吴敬梓. 儒林外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 [26] 李国文. 范进不可笑 [J]. 国学, 2009, (5).
- [27] 钟毓龙. 科场回忆录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 [28] 王养冲, 王令愉. 法国大革命史: 1789-1794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 [29] 李力. 被夸大的“历史的同情”: 蒲松龄的科举考试观念研究——以《聊斋志异》的文本分析为例 [J]. 蒲松龄研究, 2009, (1).
- [30] 陈寅恪. 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J]. 学衡, 1931, (74).
- [31] 姜国钧. 中国教育周期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32] 刘海峰. 高考并非万恶之源 [J].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06, (1).
- [33] 新京报主编. 科举百年祭——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察 [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6.
- [34] 刘海峰. 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废科举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8, (3).
- [35] 林毓生.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36] [日] 前野直彬著, 傅赖会译. 蒲松龄传 [M]. 台北: 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6.
- [37] 余家菊. 回忆录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48.
- [38] [英] 查尔斯·麦基著, 冯松译. 可怕的错觉——人人都会犯的致命错误 [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 [39] 启功. 说八股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 (3).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I L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PRC)

[Abstract]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has the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regarding the research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u Songling uses the lifetime to prepare to tak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mentioned in many chapters in this book, which shows us the colorful pic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ghosts, the monster, and fox, females, the scholars and etc. in the book expressed their happiness, anger, and sadnes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reflected Pu Songling's true idea about the system, but it is actually far from understanding of hatred and depression by the later gener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deep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public has formed the sharp contrast comments: The public showed the deep understanding and forgiveness for Pu Songling's deed, but they are extremely acrimonious and unfair to Fan Jin getting titl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Due to such circumstance, the public has formed the terrible illusion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is paper believe that people should re-examin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from the object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Pu Songl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ight-part Essay

(责任编辑 王兆璠/校对 丁)